

世界银行学院发展研究报告

讲述 的权利

——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 编

马庆平 审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学院发展研究报告

讲述的权利

——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 编

马庆平 审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The Right to Tell: The Role of Mass Media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02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 W., Washington, D. C. 20433, U. S. A.

This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in English as *The Right to Tell: The Role of Mass Media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02.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arranged by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 the original language will govern.

《讲述的权利：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2005 年，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 2002 年以英文出版，书名为《讲述的权利：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负责翻译的准确性，如出现理解歧义，以英文原版为准。

本书的发现、阐释和结论为作者的观点，未必反映世界银行执行董事或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的准确无误。本书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资料，并不表示世界银行的任何部门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讲述的权利：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世界银行《讲述的权利：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编写组编；马庆平等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9

(世界银行学院发展研究报告)

书名原文：The Right to Tell

ISBN 7-5005-8538-1

I. 讲… II. ①世… ②马… III. 传播媒介—作用—经济发展—研究
IV. F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181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 @ 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17.25 印张 341 000 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ISBN 7-5005-8538-1/F·7434

图字：01-2005-548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信息流通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于信息流通的重要作用已经有过诸多论述。信息流通可以帮助企业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投资风险。信息流通还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并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正确的评估。与此同时，信息流通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做出理智的选择，无论是选择所购买的商品还是选择自己的人生职业。因此，当今时代的信息流通，不仅包括一国之内的而且还包括跨越国境的，会极大地增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信息认知能力。然而不尽人意的现实是，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总是处于一种相对短缺的状态。

今后的几十年，中国会朝着更加繁荣和富裕的道路发展。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实现既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是需要经常考虑的。就资源而言，中国是富有的。仅人力资源就是巨大的。改善投资的信息流通环境，促进信息的传播，将会使中国迈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责任改善信息流通环境，提高社会的信息认知程度。我相信，中国具有巨大的潜能来应对这一挑战。

世界银行学院
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
胡缅·伊斯拉姆

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要我为《讲述的权利》一书写序言，并发来这本书的电子文本。大致浏览一遍我就有先睹为快之感。这本由世界银行学院提供的发展研究报告，无论从观点还是从资料看，都应该视为值得推荐，值得一读的好书。尤其值得向经济和新闻两个领域的学界、业界人士以及相关的政府公务员推荐。

大众媒体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讲述的权利》一书所要讲述的主题。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大众媒体能够增加政府透明度，降低民众和政府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以便民众可以做出知情的选择；它能够聚焦政府某些不当的行政行为，抨击部分落后于潮流发展的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民众的公共利益；同时，它在形成公司政策、完善公司治理方面也很有影响。

在论述大众媒体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著作中，《讲述的权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同时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作者阵容强大、内容覆盖广泛、具有全球视野、案例新颖丰富、很多理论阐述深刻、精辟。

作者阵容强大。该书在作者的选择上颇具匠心，兼顾到“媒体”和“经济”，实务和学术。所以，作者中既有知名的经济学人，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席勒；也包括资深的媒体人士，如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总编马福斯·阿南、埃及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开罗时报》编辑希沙姆·卡西姆。既有一线记者，如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专家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媒体法律政策比较研究项

目创始人和共同主任摩诺尔·普瑞斯。他们都术业有专攻，从不同的角度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内容覆盖广泛。作为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制度》一书的延续，该书主要研究了以下的问题：如在不同的环境下，媒体是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在存在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下，媒体自身的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环境支持，等等。从三个大的方面——媒体怎样支持市场、媒体的运营环境、媒体如何看待媒体，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内容极其丰富，仅从该书的篇章目录上就可窥豹一斑：如“政府的透明度”、“大众媒体的政治责任”、“媒体的非理性繁荣”、“发布新闻和政治影响”、“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媒体所有制与社会经济繁荣”、“媒体产业：大众传播的经济基础”、“新闻媒体的法律环境”、“媒体的变迁：经济霸权主义”、“正直新闻记者的十大训诫”，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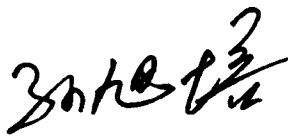
具有全球视野。本书是由世界银行学院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胡缅·伊斯拉姆领衔完成的，20多位作者不仅研究领域相异，且来自于世界各地。不仅有我们较为熟悉的英美两国的人士，更有瑞典、泰国、孟加拉、埃及、波兰等较少关注的国家的专家学者。他们所论述的问题，如新闻自由和民主政治、媒体所有制、宏观经济结构与媒体经济状况、媒体运营的法律环境、媒体相关行业的政策、媒体从业人员的能力培训、对新闻媒体的制衡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具有普遍意义。本书还以大量的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譬如书中一章是对媒体所有制的研究，该篇作者搜集了97个国家的媒体所有制形式的新数据，统计了国有制的总体水平、独裁状况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参照《2000年市场与媒体事实手册》、《2000年世界报业趋势报告》和《独联体媒体报告》，以受众市场份额和1999年提供地方新闻的情况为标准，对新闻机构进行筛选，然后再分析得出结论。发现之一就是“在97个国家样本中，仅4%的媒体企业为分散所有制，2%以下是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结构，雇员拥有仅占2%。计数统计表明，家族控制的报纸占总数的57%，家族控制的电视台占总数的34%。国有制也大量存在。政府控制大约29%的报纸和60%的电视台。政府还拥有72%的广播电台。”这

些数据是很难从一般的著述中获得的。

案例新颖丰富。对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媒体，我国目前已有为数不少的著述进行介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小国的媒体发展情况的研究分析，却不多见。而对第三世界国家相关情况的介绍，正是本书的一大看点，如东欧剧变前后，波兰新闻媒体在经营方面的变迁；泰国的信息准入和《信息公开法案》实施中遭遇的障碍；孟加拉国独立后，媒体发展的局限和挑战以及其在揭露腐败和坚持人权方面的贡献；等等，都是亲历一线的资深媒体人士进行的客观的实证研究。

该书的理论阐述也有不少精辟之处。本书是译著，作者都是国外学者，由于国情和社会环境迥异，他们的一些见解，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独到，理论阐述颇为新鲜。如在论述大众媒体具备怎样的特征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该书提出的三点要素——具有独立性、能提供高品质的信息、覆盖范围广泛，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书中说，媒体如果不独立，就极有可能会罔顾公共利益，不会设法报道必要的信息，也不会如实报道所得的信息。没有独立性作坚实基础，奢望媒体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信息，只是虚幻的镜花水月。缺失前两个要素的媒体，即使在非市场因素的作用下覆盖范围广泛，也是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这本集众多专家学者思想精华的《讲述的权利》，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以及一些强调媒体可以作为促进变革和经济增长催化剂的实证案例，颇具借鉴和启示意义，可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推进当前我国的新闻改革。



2004年9月于武昌喻家山

前言

全球有 12 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这些穷人中，有许多不仅在身体和人性上饱受剥夺之苦，而且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上缺少发言权。与此同时，腐败和管理不力使得援助的作用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在应对这些挑战上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在诸多领域有所作为。在一个实际的发展战略中，关键内容之一就是如何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增加透明度。要减少贫困，我们必须开放信息准入，提高信息质量。人们获得了较多的信息，就有能力做出更好的选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新闻自由不是只有富裕国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它是公平发展的核心。媒体能够揭露腐败，能够聚焦政府的行为并对公共政策予以督查，能够让人们对管理和改革发表不同的观点，能够帮助公众对改革建立认同感。这样，媒体会使市场运行得更好。这些市场，包括小到印度尼西亚的蔬菜交易，大到伦敦和纽约的全球外汇和资本市场。媒体能够促进贸易，能够使思想和发明的传播跨越国界。我们还看到，媒体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它们把健康和教育信息传播到诸如乌干达和尼加拉瓜的偏远村庄。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独立性会是很脆弱的并很容易受到威胁。在很多时候政府会束缚媒体。而在另一些时候，被强大的私人企业所控制的媒体也会在报道上受到影响。此外，文化水平低、人力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等不利因素，同样会使媒体的积极作用受到约束。我们只要看看在卢旺达所进行的战争宣传，就可以明白不负责任的报道和操纵性的报道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很显然，为了推动发展，就新闻自由、媒体自身权利以及制衡制度而言，媒体需要一个适宜的环境。

在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中，有一章讲述了媒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书是上述工作的延续。它的重要贡献在于使我们懂得，媒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怎样给发展带来影响，同时用证据为我们揭示，媒体在支持经济和政治市场，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发言机会的同时，媒体自身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环境。为此，本书中不仅有学者的观点，同时还有在一线工作的记者亲历的感受。本书对于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新闻记者、研究人员和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出版将会推动世界银行正在开展的有关增加透明度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工作，同时，有利于世界银行学院正在开展的对五十多个国家的记者进行的调查式报道培训，有利于世界银行集团外务部正在与各国政府就开展有效交流所进行的合作。

从长远看，本书仅是世界银行与它的伙伴一起，为了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世界和更加负责任的政府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的一部分。

詹姆斯·D. 沃尔芬森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世界银行《2002 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的续编，由胡绳·伊斯拉姆领衔完成。西门·詹柯夫和卡拉利·麦克利什完成了全书的编纂工作，艾丽斯·凡蒂奇完成了全书的编辑校对工作，约翰·狄迪尔负责该书的出版事宜。以下是本书作者的简介。

马福斯·阿南 (Mahfuz Anam)：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总编。

蒂莫西·贝斯利 (Timothy Besley)：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森特利丰田国际经济及关联学科中心主任。

罗宾·伯格 (Robin Burgess)：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森特利丰田国际经济及关联学科中心的经济组织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

蒂姆·卡林顿 (Tim Carrington)：华盛顿世界银行学院资深公共信息官员。

马克·查文杜卡 (Mark Chavunduka)：津巴布韦有影响的独立报纸《津巴布韦独立报》的前任编辑。

卡维·钟吉塔翁 (Kavi Chongkittavorn)：泰国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民族报》的执行编辑。

西门·詹柯夫 (Simeon Djankov)：世界银行私营经济顾问机构的资深经济学家。

亚历山大·戴克 (Alexander Dyck)：美国哈佛商学院企业与政府关系学副教授。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记者，作家。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爱德华·赫尔曼 (Edward Herman)：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财政金融荣誉退休教授。

胡缅·伊斯拉姆 (Roumeen Islam): 世界银行学院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

希沙姆·卡西姆 (Hisham Kassem): 埃及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开罗时报》编辑。

彼得·克鲁格 (Peter Krug): 俄克拉何马大学法学院传播法学教授。

卡拉利·麦克利什 (Caralee McLiesh): 世界银行私营经济顾问机构的经济学家。

亚当·米赫尼克 (Adam Michnik): 波兰有影响的日报《选举报》总编。

维克多·穆奇尼克 (Victor Muchnik): 俄罗斯托木斯克电视二台总编。

尤利亚·穆奇尼克 (Yulia Muchnik): 俄罗斯托木斯克电视二台记者。

马克·纳尔逊 (Mark Nelson): 世界银行学院巴黎项目经理。

塔提纳·尼诺瓦 (Tatiana Nenova): 世界银行私营经济顾问机构的金融经济学家。

布鲁斯·欧文 (Bruce Owen): 微观经济分析咨询机构华盛顿咨询公司总裁。

安德里亚·帕特 (Andrea Prat):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经济研究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

摩诺尔·普瑞斯 (Monroe Price): 英国牛津大学媒体法律政策比较研究项目创始人和共同主任;纽约授业座大学本杰明·N.卡多佐法学院约瑟夫与塞迪·丹西格项目法学教授。

罗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斯坦利·B.莱索项目经济学教授。

安德雷·施莱佛 (Andrei Shleifer): 美国哈佛大学惠普尔·V.N.琼斯项目经济学教授。1999年获得约翰·贝兹·克拉克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美国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商学院研究生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金融经济学教授。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卫·斯特龙伯格 (David Strömberg):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经济研究学院研究人员。

鲁思·沃尔登 (Ruth Walden):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及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路易吉·金格尔斯 (Luigi Zingales):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罗伯特·C.麦克科马克项目企业与金融学教授。

目 录

序 v

前言 ix

作者简介 xi

1. 概述：媒体讲述什么，为什么讲述 1

胡缅·伊斯拉姆

第一部分：媒体怎样支持市场

2. 政府的透明度 2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3. 大众媒体与政治责任 39

蒂莫西·贝斯利、罗宾·伯格斯和安德里亚·帕特

4. 美国的媒体与市场 53

爱德华·S. 赫尔曼

5. 媒体的非理性繁荣 73

罗伯特·J. 席勒

6. 发布新闻和政治影响 83

大卫·斯特龙伯格

7. 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93

亚历山大·戴克和路易吉·金格尔斯

第二部分：媒体的运营环境

8. 媒体所有制与社会经济繁荣 121
西门·詹柯夫、卡拉利·麦克利什、塔提纳·尼诺瓦和安德雷·施莱佛
9. 媒体产业：大众传播的经济基础 143
布鲁斯·M. 欧文
10. 新闻媒体的法律环境 159
彼得·克鲁格和摩诺尔·E. 普瑞斯
11. 侮辱法 173
鲁思·沃尔登
12. 媒体的变迁：经济霸权主义 189
蒂姆·卡林顿和马克·纳尔逊

第三部分：媒体如何看待媒体

13. 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209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4. 泰国的媒体和信息准入 215
卡维·钟吉塔翁
15. 孟加拉国的媒体与社会发展 225
马福斯·阿南
16. 为什么《开罗时报》设在塞浦路斯 233
希沙姆·卡西姆
17. 津巴布韦媒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39
马克·G. 查文杜卡
18. 正直新闻记者的十大训诫 247
亚当·米赫尼克
19. 生存在剧变时代中的一个地方电视台 255
维克多·穆奇尼克和尤利亚·穆奇尼克
- 译者的话 261

1

概述：媒体讲述什么，为什么讲述

胡缅·伊斯拉姆

无论是公共媒体还是私营媒体，都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可以为统治者收集支持的舆论，也可以收集反对的舆论；他们既可以强调媒体业的观点，也可以对自己文过饰非；他们可以表达民众的声音，也可以不这样做，而只是简单地传递经济资讯。为了基本生存，媒体要依靠管理他们的政府，依靠通过他们做广告并付费的公司，依靠他们所服务的消费者。要在这众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媒体如何实现平衡不仅决定着它自身的生存能力，还决定着它对经济的影响。本书将要讲述的，就是决定媒体业是否能够和如何支持经济进步的若干因素。

显而易见，作为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媒体在具备以下3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媒体具有独立性、提供高品质的信息、覆盖范围广泛。如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第2章所述，当媒体降低了信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天然不对称性，并降低了在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时候，这样的媒体才能通过监督和政府问责，提高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感，同时使消费者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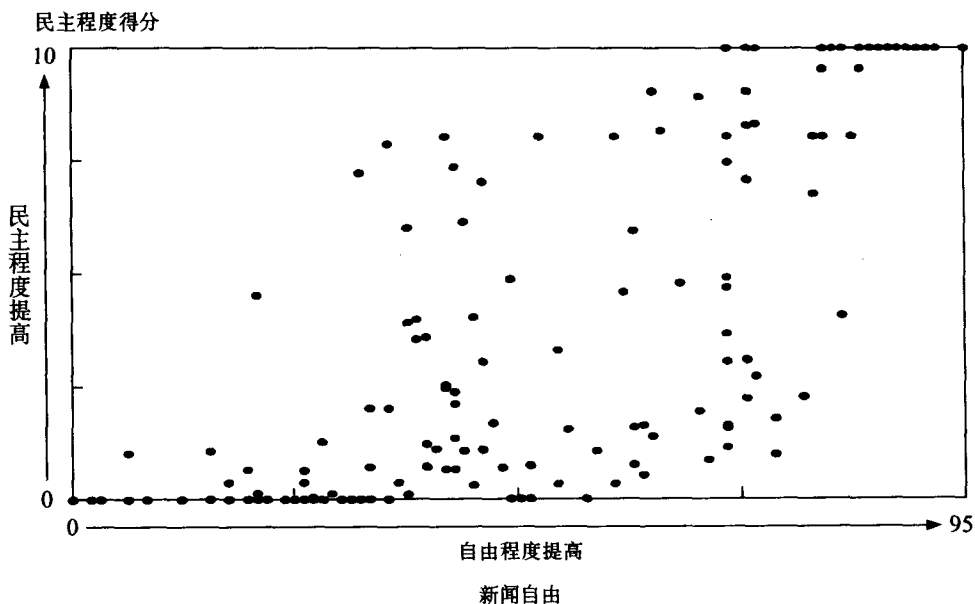
本书引用了许多案例来证明媒体所提供信息的有用性。亚历山大·戴克和路易吉·金格尔斯在第7章将讨论媒体如何向公司经理和董事施加压力，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行事，避免引发责难和消费者的联合抵制。他们还谈到，在马来西亚对事业机构投资者和资产分析家的一项近期调查中问道，在考虑公司管理和决定公司上市时，哪种因素对他们来说最重要。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和新闻媒体对一家公司评论的频率和内容，远比通常的学术争论的焦点重要得多。然而，可靠信息的及时传递取决于媒体的运营和国家对它的管理。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提供了各国媒体运营和管理的例证，并强调了何种类型的公共政策和经济条件可能会妨碍媒体在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

在讨论有效媒体应具备的3个条件——独立性、高质量和覆盖面——之前，我想先请读者留意一下有关本书主题的两个问题。第一，是自由媒体与民主政治

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通常比较民主的国家媒体也会比较自由。但究竟是自由媒体促进民主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造就了自由媒体？无疑，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媒体的自由度和民主政治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民主政治国家，媒体的自由程度也是不同的。相对不民主的国家对媒体自由度的容许限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两个民主国家，俄罗斯和美国，对媒体的态度和媒体自由的概念相去甚远。此外，在同样的民主政治国家，某些新闻报道可能不受管制，而某些新闻报道则要受管制。例如，经济新闻可能会比纯粹的政治新闻所受管制程度较轻。媒体的自由程度还与收入密切相关：越富裕的国家对信息越重视。当然也存在不同情况。哥伦比亚、葡萄牙和乌克兰 3 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度大致相同，但对媒体自由所采取的措施却有很大不同。

我想提醒读者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与媒体的独立性、高质量和覆盖相关的法律和规制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有关媒体的法律只具备有限的效用。制定一项法律并不能保证被实施或产生效用，部分原因是由于实施法律比制定法律要困难得多。而实施非正式的规章则更可能与法律发生冲突，从而降低了它的效用。在许多国家，媒体的自由和独立并不仅仅通过法律来保证，还要靠文化和社会观念。因此，即使英国有非常严格的《官方机密法》（在 1989 年以前，连英国首相食用的饼干种类都属于官方机密），但是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它的媒体自由度都是高的，自由之家（美国的新闻自由组织，1941 年在纽约成立。英文“Freedom House”。——译者注）依据媒体自由指数给英国媒体打了 80% 的高分。

图 1.1 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关系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

媒体自由度随着文化和社会期待的影响而变化。文化和社会期待反过来也随着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影响而变化。在媒体拥有长期独立传统和商业氛围的国家里，独裁政府制定的法律限制很难长时间维持。新生媒体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信息长时间匮乏或信息被保密的国家里，以下几种现象会影响媒体的作用：（1）更多信息量的潜在价值被低估或未被很好地评估；（2）公众认为信息没什么用，因为政治舆论联盟有能力编造并不存在的于己有利的信息；（3）媒体的经济状况差以及消费者基础薄弱也会使媒体变得脆弱。但不管怎样，这几种现象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善。

有证据表明，法律体系是重要的。一方面，政府通过编写法律，建立法律体系，使自己对媒体所采取的行动合法化。另一方面，法律也可以保护媒体的权利。记者已经在使用法律保护他们的知情权和报道权。有些时候，媒体法律尤其重要，因为即使政府并非故意封锁消息，但消息不容易被获取因而不能被公开报道。即使各方有时不清楚法律的效用，但鼓励言论自由的法律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当司法制度有效和独立的时候，通过一项法律这一行为本身就能够限制一些弊端，建立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行为概念。法律的通过使信息自由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并进而导致信息自由的变化。正如卡维·钟吉塔翁在第14章所论述的，泰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鼓励民众向政府索取信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期待和行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查文杜卡在第17章提到，津巴布韦政府制定一系列法律，压制媒体公布信息。但希沙姆·卡西姆在第16章提到，富于创新精神的媒体企业经常想出对策，与束缚它们的法律巧妙周旋。

下面，我将围绕上述影响媒体效果的3大因素展开讨论：独立性、高质量和覆盖¹。

独立性和高质量

独立性是指媒体如实报道所得到的信息，而不畏惧遭到处罚的能力。它还指媒体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够设法得到必要的信息并进行报道。没有媒体能够做到完全独立：即使政府不直接处罚对其不利的新闻，但政府可以拒绝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斯蒂格利茨指出，媒体与向其泄漏信息的人是互相依赖的。泄漏信息者对于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为公众提供的可能是永远不会知道的秘密信息。但媒体也会被政府官员误导，从事有利于政府利益和目标的报道。

媒体的高质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描述高质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质量的媒体至少能够获得并有能力客观报道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信息。他们必须能够反映各种不同观点，并对所发布的信息负责，能够将获得的信息诠释出

1 有些内容可参见《2001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

新闻价值和“真理”。在第13章，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最好的”新闻的诠释是这样的：不一定是最先获得的新闻，“但经常是被发布得最好的新闻”。爱德华·赫尔曼在第4章对客观性——高质量的一个关键要素——的定义是：“首先……展现故事的多个侧面，探寻出不含政治束缚的事实，展现出公正和全面的事实；其次，在一贯执行的新闻价值标准、不受政治因素影响、不存意识形态偏见和不出于战略或赢利考虑而折衷的基础上，决定哪些信息有新闻价值。”

独立的媒体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否则就不能做出可信的报道。媒体具有影响大量民众或一些关键人物行为的潜质，所以能够提升或降低事件在公众眼中的重要程度，从而影响社会利益的划分。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需要接受制衡。高质量的媒体拥有强大的力量去影响信息的消费者。戴克和金格尔斯指出，在韩国，《金融时报》对韩国电信（韩国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译者注）内部交易的报道引发了信用危机，因为该报比地方报纸具有更高的声誉。

决定媒体独立性的主要因素包括：

- (1) 媒体的所有制结构；
- (2) 媒体企业的经济结构、经济条件和资金的可获性；
- (3) 在获取信息、生产信息、媒体准入以及内容等方面的法律管理规定；
- (4) 媒体相关产业的政策。

高质量和独立性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例如，资金来源集中的媒体会使新闻质量大打折扣。因此，高质量和独立性要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以下是影响质量的另外两个因素：

- (1) 对记者和媒体企业管理者的培训和他们自身的能力；
- (2) 对记者和媒体企业工作人员的制衡。

媒体所有制

媒体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媒体公共所有制的支持者指出，由于信息是公共物品，也就是说，一旦信息被提供给消费者，就很难控制它不流传到没有为之付费的人那里，因此私营媒体所有者会倾向于较少提供那些社会大众都感兴趣的信息。他们还指出，私有媒体企业有可能仅仅反映社会中少数群体的观点²，而国家所有制的媒体企业才有可能向公众展示

2 由于拥有媒体机构可以获得潜在的巨大非经济利益，因此，公共媒体和私有媒体的所有者都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媒体所有权集中的方式来控制媒体机构。